

红色之旅·百年记忆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10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汇聚起中华民族穿越风雨、走向复兴的磅礴力量,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的青春乐章。历史深刻表明,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

——编者

抗战时期,4万余青年知识分子怀揣理想——

奔赴延安

本报记者 张丹华

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两张1943年七贤庄一号院和七号院的房租收据吸引了很多参观者的目光。

“房租也就是房地产税,新中国成立前,房屋所有人在出租房屋时必须按房租的一定比率向市政缴纳房租。”文物捐赠者、西安市红色文物收藏家雷晴波先生说。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国共产党租用了陕西革命家成柏仁位于西七路的七贤庄,设立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今年88岁的雷晴波老人捐赠的收据,正是那段历史的见证。

七贤庄,从牙科诊所到抗日前哨

建于西安明城墙内的七贤庄,唐时属东宫外永昌坊。民国初年,这里曾是一片荒芜,杂草丛生,后被银行资本家用于房地产开发。1936年,十座由西向东、南北走向的工字形庭院建筑群在这里落成。借《晋书》中的“竹林七贤”而得名,由当时的文化名人成柏仁题书“七贤庄”镶嵌于庄首。

站在“八办”纪念馆外,门边悬挂着的一块牌匾,都被岁月刻下了斑驳的痕迹。其中有一块青铜色的匾额,上书“冯海伯诊所”几个大字。

1935年,红军一方面军到达陕北,频繁而激烈的战斗、恶劣的生存环境,让许多士兵饱受伤病折磨。为解决医药用品和医疗器械不足的问题,周恩来授意中共驻东北军党代表刘鼎,以200块银元的押金租下了七贤庄一号院,建起了由德国牙医冯海伯经营的牙科诊所,其真实用途,是为延安采买、转运医疗器械和通信器材的一座秘密交通站。

“七七事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在七贤庄一号院的门口,正式挂上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的牌子,随后又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陕办事处”。至此,“八办”成为我党我军设立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公开的办事机构,也成为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实堡垒,以及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哨。

斯诺,震动世界的《西行漫记》

“当时很多进步青年通过‘八办’前往延安。”雷晴波老人说。著名外交家黄华则是最先奔赴延安的青年之一。1936年6月,黄华在燕京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和领导人之一。入党后,他立即萌生了去陕北参加红军的念头。恰好这时,燕京大学的讲师埃德加·斯诺邀请他同行去陕北采访、当翻译,黄华不假思索地答应了。

1936年6月,从北京赶到西安后,黄华在刘鼎的协助下经过两天的路程,换上东北军制服,突破种种盘查,赶到延安与斯诺重逢。

斯诺的这次延安之行最大的成果,就是写出了震动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向西方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辉煌历程和毛泽东同志的传奇经历。这本书中就有黄华的功劳,特别是后来随斯诺到前线去采访,黄华每天把斯诺的英文初稿翻译成中文,请信使带回延安请毛泽东同志过目。但是因为当时黄华到了苏区后即下决心不再离去,于是他叮嘱斯诺写文章、写书都不要用他的名字和照片,所以斯诺的书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再版时才提到黄华的参与。

燃烧着希望,接受洗礼

走进七贤庄七号院,东边和南边的屋子分别为男女生宿舍,宿舍里大通铺上铺着白色的床单,一排能睡六七个人。雷晴波老人捐赠的七号院房租收据正挂在宿舍门口。房租收据大约有便签纸的两倍大小,纸张已经发黄。在“房主姓名”一栏里,写着“八路军”三个字。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从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克服种种艰难险阻,来到八路军驻陕办事处,要求奔赴延安。为了更好地完成青年们的接待和分配任务,1938年4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租用七贤庄的七号院,组织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吴安青训班等学校成立“联合招生委员会”,为中国共产党输送“新鲜血液”。

20世纪40年代初的延安,是抗日干部培训学校集中的地方,有抗日军政大学、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中央党校、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经常有学员毕业,调到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去战斗。敌后的干部,也不断调回这里学习。

抗战时期,这些奔赴延安的青年成为一道独特风景线。诗人何其芳描述:“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乐的日子。”

据任弼时1943年12月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是什么吸引这么多人义无反顾地奔赴延安?

摄影家吴印咸的答案是:“这里的人们个个显得十分愉快、质朴,人们之间的关系又是那么融洽。我看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人身穿粗布制服出现在延安街头,和战士、老乡唠家常,谈笑风生……”丁玲的答案是“这是乐园”。“我们才到这里半年……百事乐业,耕者有田。八小时工作,有各种保险。”

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张建儒说,青年知识分子在延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洗礼,有的奔赴抗日前线奋勇杀敌,有的以笔为枪,创作出无数鼓舞人心的文学艺术作品。他们心怀理想,为全民族抗战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

危亡之际,8000余爱国学子从四面八方——

汇聚西南联大

本报记者 李茂颖

诞生170余位院士,8位“两弹一星”元勋,2位诺贝尔奖得主……只存在了8年零8个月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抗日战争炮火的洗礼中,书写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与文化命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被迫陆续南迁。1938年,三校在昆明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如今,西南联大旧址坐落于云南师范大学,站在古朴的牌匾下,远处的张伯苓、蒋梦麟和梅贻琦三位校长的青铜雕塑静静地伫立着,“一二·一”运动历史的石雕、铁皮屋顶的校舍默默地讲述着过去的故事。

2011年9月,云南师范大学在旧址上成立西南联大博物馆。2018年10月,新建成的西南联大博物馆正式开馆,一批珍贵的资料和抗战实物在馆内首次公开。

弦歌不辍,还原场景复刻辉煌历史

站在西南联大博物馆的入口,“刚毅坚卓”4个大字映入眼帘。正是在国难当头的历史时刻,在极度简陋和艰苦的环境中,西南联大全体师生精诚团结,将“刚毅坚卓”的联大校训贯穿始终。

新建的西南联大博物馆以西南联大原图书馆外观复原,新增馆舍建筑3400平方米,展厅面积2300平方米。现有馆藏实物1.2万余件,历史图片5000余张,相关书籍及档案资料万余份,是目前全国有关西南联大及“一二·一”运动历史图片实物资料展示最多、最集中的展馆。

“目前博物馆的展览以西南联大历史为主题,按照时间及

青年突击队、青年志愿者坚守一线——

践行无悔誓言

本报记者 贺勇

在繁华的北京西直门商业区,矗立着一座巍峨的建筑物:高耸的尖顶上有一颗红色五角星,主楼两侧呈半圆形排列着18根高大廊柱——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十大建筑之一——北京展览馆。1954年1月13日,北京建工胡耀林等18名团员青年,在北京展览馆工地举起了全国第一面青年突击队大旗。胡耀林青年突击队成立后,原定478个工日才能完成的施工任务,仅用11个月就完成了,成为新中国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从这一天起,“青年突击队”这个响亮的名字从火热的工地走向新中国建设的各行各业,成为创业、革新、奋进的生力军。

一株株青绿色的稻秆,一串串灌浆后的稻谷——如今的“北大仓”,在过去却是“北大荒”。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的5名青年,向组织递交了组建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倡议书,经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各地纷纷组建青年垦荒队,奔赴边疆海防,挺进沟岭河滩。用青春和汗水培育的垦荒精神,犹如灯塔指引后人砥砺前行。

哪里需要,哪里就有青年突击队和志愿者的身影。在不久前举行的“相约北京”冬奥会测试赛中,来自24所高校和12个其他单位的1026名志愿者活跃在赛场周边。他们从3月27



本版式设计:张丹华 曹怡晴 本版责编:孟丹峰



多名学生中,先后从军1100多名,每100里便有14人为保卫祖国投笔从戎。

刚毅坚卓,汲取共克时艰精神力量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域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沿着参观路线前行,前面正对着的是西南联合大学的校歌。触摸铜制的歌词,慷慨激昂的旋律在馆内响起。这首校歌,诞生于战火纷飞之时,高扬的爱国主义激励着西南联大学子投笔从戎,更是将爱国情怀代代相传到今天。

刘琳是馆内的一名大学生志愿讲解员,她分享了一个故事:当年昆明遭遇空袭,教授陈达带着学生们逃到了大山里,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大家席地而坐,他又开始给同学们授课。“西南联大的精神内涵就是刚毅坚卓。”刘琳说。

1946年,西南联大“胜利关闭”,三校北返。西南联大旧址保留了原教室、西南联大纪念碑、“一二·一”运动四烈士墓、闻一多先生衣冠冢等历史遗存。芳草如茵的民主草坪,仿佛能看到当年师生们慷慨激昂的身影。

“西南联大并不是只在象牙塔里面办学,而是在思考整个国家民族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办学的使命。也正是与国家民族命运相连,它才有了如此卓越的育人成就。”李红英说。

日入驻场馆,至4月10日比赛结束,为测试活动提供了热情专业规范的志愿服务,成为一道亮丽的青春风景线。

青春的长度和时间有关,青春的价值由奉献决定。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7万多支青年突击队、163万多名团员青年青年坚守社区防控、医疗救治、物资生产第一线,170多万青年踊跃参与志愿服务,还有很多青年积极捐款捐物、义务献血,展现出担当和奉献精神。

岁月在更迭,青年会老去,但青春的号声经久不息,嘹亮而清澈。

《青春之歌》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述革命知识分子成长史的优秀长篇小说,出版60余年来,始终回响在几代中国人的青春岁月里。1950年,作家杨沫因病休养,抗战时期的记忆经常浮现在她的脑海,那些坚贞不屈、英勇就义的共产党员形象与她的个人经历交织在一起,促使她拿起笔来,创作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

1951年9月,经过一年多的酝酿,杨沫开始动笔写作,小说初名为《千锤百炼》,后改为《烧不尽的野火》,最终在出版时定名为《青春之歌》。经过六七次重写、修改,小说初稿在1955年4月底全部完成。小说的出版并不顺利,几经周折,《青春之歌》终于在1958年1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小说出版后很快成为畅销书,短短半年时间就发行39万册,至1959年6月共印刷13次,发行121万册。1959年下半年,杨沫根据各方意见,对小说进行系统修改,并于1960年推出《青春之歌》再版本。

“作品以‘九一八’到‘一二·九’这一历史时期为背景,塑造了林道静这一觉醒、成长的革命青年形象,将林道静的人生经历融入中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宏大叙事。”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武新军介绍,“林道静、卢嘉川、林红、江华……一个青年布尔什维克的鲜明形象,成为当时青年的榜样,永远定格在人们心中。”

1959年初,杨沫将小说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为了寻找饰演林道静的最佳人选,导演崔嵬在全国发起一场寻找“林道静”的活动。最后,崔嵬起用了湖北歌剧院演员谢芳来扮演林道静。时隔62年再忆过往,85岁的谢芳感慨:“小说出版一年后,就拍成了上下两部电影,《青春之歌》是一个奇迹。”

杨沫曾说:“青春应当是鲜红的,一个人只有把他的生命和时代、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结合在一起,生命才有意义,才灿若星辰,才不虚度年华。”个人价值与广阔时代相连,青年要勇担社会和历史赋予的重任,这是《青春之歌》留给我们的启示。

图①:延安宝塔山。本报记者 张丹华摄 图②:西安七贤庄七号院大学的招生广告。资料图片 图③:国家体育馆“相约北京”冰球比赛结束后,志愿者和工作人员合影。付慧琳摄(人民视觉) 图④:红色主题文化秀《延安 延安》演出剧照。新华社记者 陶明摄



青春之歌 经久回响

本报记者 张珊珊